

蠡測集

——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大时段研究

袁行霈 著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丛

中華書局

蠡测集

——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大时段研究

袁行霈 著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丛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蠡测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大时段研究/袁行霈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9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丛)

ISBN 978-7-101-12689-1

I. 蠡… II. 袁…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②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I209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6965 号

书 名 蠡测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大时段研究

著 者 袁行霈

丛 书 名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丛

责任编辑 许庆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9 $\frac{3}{4}$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689-1

定 价 48.00 元

前 言

本书所收论文大都是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大时段研究。或以为是宏观研究,或者用时髦的说法属于宏大叙事。但我避免用后两种说法,因为感觉上宏观研究似乎有摆脱微观研究的意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提倡过,不久就式微了,脱离了微观研究的宏观研究做不好便会流于大而无当,反不如微观的实证的研究来得实在可信;而所谓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带有西方现代主义的色彩,容易将历史的发展简单化,这正是我尽可能避免的。我宁可用“大时段研究”来表明本书的架构和主旨。

其实,本书所收录的一些文章不过是由我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华文明史》全书的总绪论,或某一段文学史、文明史的分绪论而已。本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引导,甚至连预设的计划也不存在,只是根据一时之需要写来,谈不到什么系统性。既然是绪论,难免有提炼、有概括,涉及的时间也会长一些。绪论与各章节之间互相配合,就不

至于落空了。从另一方面看,只有微观的实证研究,只有若干个案的研究,是难以构成文学史或文明史的,个案需要贯穿,绪论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犹如摄影机之有普通镜头、长焦镜头和广角镜头之别,各有其用途,也各有其长处,全看摄影的需要了。

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宛如浩瀚的大海,本书也不过是以蠡测海,岂能见其全貌? 只是受好奇心的驱使,尝试为之,聊备一说而已!

袁行霈

2017年3月28日

目 录

前言	1
我的中国文化时地观	1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思考	11
关于中华文明史的理论思考	40
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的理论思考	74
乱世的文学	
——三世纪至六世纪	101
隋唐至明中叶文学发展的趋势	135
中国文化的盛年期	
——七世纪至十六世纪	186
文化的馈赠	218
中国文学的特色	224
中国诗学的特点与民族诗学的建立	230
中华文化精神	250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	257

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	268
《新编新注十三经》刍议	282
“五经”的意义与重译的空间	299

我的中国文化时地观

一

面对悠久的中国文化,分期是研究和描述其历史发展的关键。学术界习惯按朝代划分时期,即将朝代的更替作为分期的界限,这自有其学理的根据。就学者个人而言,专攻一个朝代的历史文化,也是很自然的。然而,改朝换代乃是政权的转移,适合于政治史,是否适合作为文化史分期的依据呢?这是我长久以来不断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理想的分期法是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可以按朝代分期,也可以不按朝代分期,不可一概而论。

例如,隋唐建立统一的王朝,这既是政治分期的标志,也给文化带来新的局面。经过两百多年南北的分裂,文化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正如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所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

乎气质。”^①隋朝统一中国以后,特别是继之而建立的唐朝,在南北文化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流这两方面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从而使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至少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多元化,南方的与北方的,中国固有的与外来的,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无论在文学方面、艺术方面,还是思想方面、宗教方面,文献的整理方面,莫非如此。二是文化重心下移,从士族向庶族下移,进而开始向市民下移,这就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活力。这些特征形成一种综合的效果,就是文化格外富于创造性,也格外绚丽多彩。因此,我们可以将隋唐的统一视为文化史分期的标志。

但是改朝换代又不一定能够成为文化新时期的开始,着眼于文化本身的阶段性,不必固守朝代分期的套路,这个观点在我倡议和主持编写的《中华文明史》中已有所表述^②。

例如唐宋之间文化的变迁,实际上是从中唐开始的。中唐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的转折时代,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莫非如此。宋代在许多方面是上承中唐的:庶族士人代替士族文人开始居于文化主体的地位;城市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活跃,市民文化诉求的加强;理学的兴盛;词的繁荣等等,以上诸多方面的变化在中唐已经开其端倪。宋初士人如王禹偁、石介等每称“二百年来”如何如

① 《隋书》卷七六,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第1730页。

②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何,可见他们自己也重视本朝对中唐的延续^①。

明朝建立之初,在文化上并没有出现崭新的局面,到了明中期嘉靖(1521 开始)以后,才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印刷术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世俗化、商业化、个性化成为一时之风气。同时王学左派兴起,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向理学禁欲主义发起冲击,为思想解放开辟了一条道路^②。以上两股潮流的合力为这个时期造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文明景观。一些文人带上了市民气息,文化也带上了商品色彩。而适应市民这一新的接受群体的需要,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俗的文体生机勃勃,其中又以戏曲和小说最富于生命力,它们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金瓶梅》的出现就是这种种现象的综合反映。文学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汤显祖的《牡丹亭》所写的那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便是一

① 曾祥波博士云:“道统文统暨正统学说既然已经成为主流话语,这一学说进入诗歌,其背后隐含的那种‘(中)唐—宋’的政治、文化分期观念就以‘二百年’的形态表现出来,……使得北宋前期诗歌能够从唐末五代诗风的自然延续中醒来,自觉的续接上中唐诗歌这一传统。”见其《从唐音到宋调:以北宋前期诗歌为中心》,昆仑出版社 2006 年,第 43 页。

② 王艮说:“百姓日用即道”(《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李贽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种新的呼声。晚明诗文中也透露出重视个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调的倾向。在绘画等领域里也有新变,如徐文长的泼墨大写意花卉,任意挥洒;陈老莲的变形人物,恣肆夸张,都开启了新的格局。书法家如徐渭、王铎、倪元璐等人,狂放奇崛,不拘于传统而另树新风。从以上各方面看来,明代中叶的确是一个文化新时代的开端,我们应当将明中叶视为断代的界限。

着眼于文化本身的发展来分期,只是一个新的视角,并不排斥独立考察某一朝代的文化。如果研究某一朝代的文化史,当然只能以这个朝代的起始和终结为限,仍然应当保持按朝代分期这一方法。

不过,研究时间较长的朝代的文化史或文学史,还需要更细的分期,例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四期,也不一定按照本朝内政权的更迭划分。我在《百年徘徊——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①一文中,将初唐的下限定在玄宗开元八年(720);而盛唐的开始不是定在玄宗登基的先天元年(712),而是定在开元九年(721)。这时陈子昂、苏味道、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已经去世;王维登进士第,李白二十一岁,即将崭露头角,随后崔颢、祖咏等相继及第,诗歌创作的新局面开始了。盛唐诗坛的结束,不是定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天宝十四载(755),而定在代宗大历五年

^①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6期。在我和丁放合著的《盛唐诗坛研究》中重申了这一点,并按照这种看法阐述盛唐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770),此前762年李白已经去世,这一年杜甫也去世了,杜甫结束了诗歌的盛世。以大诗人登上诗坛和离开诗坛为标准来分期,也是立足于文学本身的阶段性,符合文学本位的宗旨。

二

至于横向的地域性考察,是亟待加强的。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见《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5—36页。)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这些地域文化是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各个分支,也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各自的贡献。陕西、河南、山东、湖北、江西、江苏等地自不待言,兹举另外几处,略加说明。

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星堆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证明了距今5000年至3000年,蜀地已有相当发达的文明,蜀地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而且与中原文化已有联系。蜀地在文学方面对中国文化也有重要的贡献,古代一些著名的作家,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洵、苏轼、苏辙等等,都出生在这

里,并在这里成长,一旦出蜀便成为大家。蜀地作为他们的文化摇篮,特别值得注意。

再如,福建是中国刻书业的中心,从宋代一直到清代经久不衰。宋代建阳刻书业尤盛,所刻印的书籍世称“建本”,其麻沙、崇化两坊最负盛名,有牌号可考的就有 30 多家,明代建阳书堂达 221 家。南宋祝穆《方輿胜览》载,两地有“图书之府”之称。其中既有善本,如宋建安(即建阳古称)黄善夫刻《史记集解索引正义》;也有大量通俗读物,如戏曲、小说、日用类书。印刷术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对人类文化的进步起到重要作用,而福建刻书业的兴盛则是福建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又如,分布在辽宁、内蒙古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距今已大约五千年,红山文化中龙的形象起源早,类型多,而且已经定型,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这里还是史前玉文化的中心之一,与长江下游环太湖的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南北辉映,显示了玉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据说玉可通神,玉制的礼器,广泛用于祭祀,这对考察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是十分宝贵的。北方的游牧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对中原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苏秉琦先生在其《考古学论述选集》中有精辟的论述^①。又如,藏传佛教不仅在西藏广泛传播,而且传播到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四川、云南等地的少

^① 见《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数民族中,即使在北京也有影响,雍和宫等多处寺庙就是证明。

三

将时间和地域结合起来,便会注意到文化中心的形成和转移。着眼于全国,每个时期都有一个或若干个文化中心,中心必定起着凝聚和辐射的作用,引领全国文化的进程。文化中心是转移的,而不是固定的。例如,河南原是商代都城所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了那时河南一带居于文化中心的地位。到了唐代,著名诗人几乎一半出自河南,足见其文化之发达。北宋定都开封,更巩固了其文化中心的地位,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反映了汴梁的繁华。但在南宋以后,文化的中心地位转移到了别处。

再如,陕西西安及其附近本是周、秦、汉、唐的政治文化中心,这几个统一王朝的辉煌,在不胜枚举的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中都得到证实,周原出土的青铜器,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众多的汉家陵阙,以及唐代宫阙、墓葬的遗址,都是中国的骄傲。包括正史在内的各种文献资料,如诗歌、文章、书法、绘画,也都向世人诉说着曾经有过的辉煌。司马迁、班固等则是这片土地哺育出的文化巨人。但到了元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这里的文化已经难以延续昔日的光彩。

又如,北京一带汉唐时称幽州,不过是边防重镇,文化相当落后,直到元代文化才繁盛起来,马可·波罗记载元

大都之繁华,元杂剧在大都的繁荣,都是证明。明清两代,朝廷通过科举、授官等途径,一方面吸纳各地人才进京,另一方面又促使精英文化向全国各地辐射,北京毫无争议地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之一。又如,上海原是一个渔村,元代开始建城,十九世纪中叶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贸易的中心,随后又一跃而成为现代国际大都会。各种新兴的文化门类和文化产业日新月异地建立起来,并带动了全国文化的发展。又如,广东文化的发达程度原来远不及黄河与长江流域其他地方,但到了唐代,广州已成为一个大都会,到了近代,广东在思想文化方面呈现明显的优势,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出自这里。

由于中国的河流大体上是自西向东,所以文化的传播和中心的移动,沿着河流东西移动比较方便,而南北原属于两个差异较大的体系,文化中心的南北移动往往造成文化的突飞猛进。南北交流大体是沿着几条路线进行,例如洛阳(或开封)—南阳—襄阳—荆州(或武昌);北京—扬州(或南京)—苏州—杭州;西安—汉中—成都。杜甫的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即勾勒了其中一条路线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南北交流对文学的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政治的中心多半在北方,而经济的后盾却在南方(特别是唐代以后),大运河(津浦线就是沿着运河修筑的)作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只要畅通着,王朝就不难维持下去。围绕着黄河、长江和运河形成文化的若干中心,是很自然的。

四

总之,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主流沿着时间的长河移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宛如乐曲的主旋律,构成中国文化的底色;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有多个发源地,各有地域的特点,其发祥与兴盛的时间也有先后之别。特色与时间不尽相同的文化板块之间互相交错、移动,呈现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文化地图,编织成中国文化的全景。

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单线演进的,而是立体推进的。所以,不研究地域文化就难以全面阐述中国文化的历程。我希望学术界经过共同的努力,构建一个文化史的立体格局,描述时与地整体演进的图景,再现时与地相互的交叉与错位。交叉的意思是,同一个时期内,各个地域的文化之间互相浸润互相影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错位的意思是,文化的进程在各个地域并异步,而是呈现不平衡状态。在某个时期,某些地域的文化进展快一些,其他地域则显得缓慢甚至停滞;另一时期文化在另一些地域进展快一些,而原来进展快的地域反而慢了下来。

总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需要探索一条新路,要将时与地综合起来加以考察,需要对文化史的分期重新界定,也需要补充地域文化的内容。文化的概念很宽泛,就单个学科而言,例如文学史、思想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等,也莫

非如此。

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文学史,1999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2006 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我和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三位教授共同主编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这两部书都就分期问题作了新的尝试。从 2008 年开始,我又开始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一共 34 卷,这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全国各地文史研究馆共同编撰的学术著作。我先后从纵、横两个方面考察了中国文化,如何将两方面有机地综合起来,还有待今后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 年第 4 期)